

【城市记忆】

第一次逛百货大楼

□李乐军

1982年10月31日,我们几十名年龄相仿的农村青年,从鲁中山区的一个封闭小镇当兵来到济南。绿皮火车从县城出发,绕道磁窑,到达济南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我们被带队领导领着走出车站来到广场集合。

紧接着是分配单位。一位穿“四个兜”的大个子领导手里拿着花名册,旁边另有一人给他打着手电,领导念到谁的名字和分配单位,就由所在连的领导从队伍里领出来站到一边。我支起耳朵听着。终于听到那浑厚响亮的声音叫到:“李乐军!”“到!”我赶忙应答。“去七连。”话音刚落,到我们那儿带兵的江副指导员就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出列。原来他就是七连的副指导员,我暗自庆幸,因为火车上已和他相熟。

分配完毕,我和王玉民、李增产等8名同志分到同一个连队,由江副指导员带领乘车去营房驻地。江副指导员说:“现在上车,请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大约还需要半个小时到达驻地。”

汽车从南门进入,七拐八拐,又从北门出来,高墙外几排瓦房隐约展现,周边全是菜地,薄薄的清雾笼罩着,门口幽暗的灯光下一个哨兵持枪站立,目送我们进了营区,老远还探着身子往里瞧。老兵们热情得很。他们边高呼欢迎新战友,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宿舍,帮助我们铺好床铺,并从食堂打来包子,江副指导员和新任命的毛班长陪我们一起吃了军营里的第一顿饭。

由于从另一地区征的新兵还未来到,我们的新训任务没下达,所以到部队后的前两天也就没多少事做,除打扫卫生擦玻璃外,毛班长又教了我们叠被子。第二天下午,我们闲得无聊,王玉民说:“咱去逛百货大楼吧?”“好!”大家异口同声,背上挎包就出了门。我们还没有配发帽徽领章,肥大的军装包裹着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走起路来呼啦呼啦的。

刚到南大门口,连长迎面走来。“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连长问道。“我们去百货大楼逛逛,顺便买点东西。”“噢,注意安全,早点回来。”与连长打过招呼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10路车,到甸柳庄又换乘1路电车直奔百货大楼去了。

泉城路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左瞧瞧,右看看,一双眼睛觉得不够使,两条腿则迈不开步。眼看就要到百货大楼了,迎面过来两个长发小青年。“新兵蛋子!新兵蛋子!”那两人中不知哪位喊了两声。我们8人都停下脚步,16只眼睛瞪着他俩。王玉民长我两岁,个子也高,首先他开了腔:“你说谁新兵蛋子?”那胖点的长头发说:“说你们呀,难道你们不是新兵蛋子吗?”“再说一遍,看我不揍扁你!”说着攥紧了拳头。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进城,但仗着年轻气盛,又加之人多势众,一个个也都握紧了拳。

眼看一场格斗就要发生,这时一声大喊从身后传来:“干什么?都老实点!”大家循声望去,毛班长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冒了出来。两个小青年一看,借机溜了。我们8人耷拉着脑袋怔怔地立在那里。

“谁让你们来的?跟谁请假了?都给我回去!”毛班长说完就往车站那边走,我们跟在他的身后,一句话不敢说,你看看我,我瞧瞧你,相互撇撇嘴,龇龇牙……

回到连队,进了屋里,毛班长命令我们靠墙站好。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谁带头去的?”毛班长问道。我们都垂着头不敢看班长。王玉民小声道:“是我先说去的。”那声音像蚊子哼哼。

“你们几个有谁提出过反对意见没有?”“没有,他提议去我们就同意去了。”大家瓮声瓮气地答道。

“都给我写检查,最少写两页信纸,王玉民写3页,5点前交上来,写不出来就别吃晚饭!解散!”

原来,连长回到连部后立即找了毛班长,问他我们出去有没有请假,为什么不安排老兵带队,并把他训了一顿,命令他立即把我们追回。

就这样,百货大楼没逛成,我们每人还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上午,指导员给我们上政治课,题目叫——从普通老百姓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ie@163.com

抚今追昔 万竹园

□李振声

识,一路飙升得以重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奉袁世凯之命来山东组建新军第五镇,袁授意他发动山东官绅募捐,为自己修建生祠。袁世凯认为,他任山东巡抚时以“德”施政,并镇压义和团有功,山东人民理应感恩戴德,为他修建生祠予以纪念。然而精明狡诈的张怀芝则觉得自己初来乍到又是军职人员,担心贸然募捐非但不能成功,反而弄巧成拙引起众怒嫁祸于自身。于是他向袁世凯表白,不用募捐,由他自己出资修祠好了,而私下里却打着为袁修祠的旗号大肆敛钱。这样既讨取了主子欢心,又肥了自家腰包,可谓名利双收,一举两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在万竹园购得了40多亩建祠土地的张怀芝调离山东,改任天津镇总兵兼第四镇统制,为袁世凯修建生祠一事得以搁置。光绪三十四年(1908),德宗、慈禧先后病故,清廷下诏“命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袁世凯被逼下野回到河南老家,而此时的张怀芝则由天津调往北京出任北洋防务大臣。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张自然不会再提为袁修建生祠一事。宣统三年(1911),清廷迫于形势需要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张怀芝自感无法再与之相处,遂辞职回到济南,并

因翠竹竞发碧绿如烟而得名的万竹园,是泉城济南难得的一处风雅幽静之地,虽与趵突泉仅一墙之隔,却是墙里墙外两重天:墙外是喷涌的泉水,像喝醉酒的李白,口若悬河,吐诗百篇;墙里是郁葱的翠竹,像熟睡中的清照,恬静淡雅,飘逸忘尘。

万竹园始建于元代,因园中多竹而得名。明隆庆四年(1570),内阁大学士、历城人殷士儋(1522—1581)不肯与祸国殃民的权臣高拱同流合污,辞官归里“筑庐于泺水之滨”,这“泺水之滨”的栖身之地,便是万竹园。殷老先生为官清廉忧国忧民,居庙堂之远仍不忘天下百姓,取“万民同乐”之意,将万竹园易名为“通乐园”,人称“阁老亭”,也叫“殷家亭”。在去世前的十年多时间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只是与一帮文友谈天说地,赋诗作画,著书立说,设坛讲学,从者如云,为这片荒芜的竹林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明朝灭亡后,万竹园几经倒手被一位姚姓秀才购得,后因姚家家道破败,美苑渐渐荒芜,沦为一片菜园。又过了六七十年,园子转到一位姓王的孀妇手中,虽经修缮有了一定起色,但也只是一处普通的农家小园,人称“王氏南园”。使小园起死回生重新勃发生机的是诗人王莘,他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购得此园,经过多年精心打磨,为万竹园营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精气神,并最终使它成为了济南的一方名胜之地。

王莘(1661—1720),祖籍浙江,十四岁随父落户历城,虽不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却对济南情真意浓爱得深沉,一生写下了无数赞美济南的优美诗篇。他对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用“潇洒似江南”评价济南并不满意,说“湖干烟乱柳毵毵,是处桃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春涨暖,可怜只说似江南。”在他看来,济南既有小桥流水人家,又有柳烟桃雨清泉,如此风姿卓群的景色应该更胜江南一筹才对!

王莘购得此园时园内有望水泉、登州泉,其中望水泉在金代《名泉碑》所载的济南七十二名泉中列第二十四位,于是他将终于泉畔的书斋命名为“二十四泉草堂”,自号“二十四泉居士”。晚年他依竹邻泉而居,在清风翠竹中汲取山水灵气,对自己的三千多首诗词筛选润色,编辑了《二十四泉草堂集》。王莘的入住,使万竹园情趣更雅,诗意更浓,是殷士儋之后又一在万竹园居住的名人雅士。

王莘之后,由于天灾人祸及连年战乱,万竹园房塌墙倒复又荒芜了多年,现在人们见到的万竹园,是民国时期在万竹园废弃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重修万竹园的,是一位叫张怀芝的山东督军。

张怀芝(1862—1934),山东东阿人,出身贫寒的他为出人头地,早年投奔北洋军,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深得袁世凯赏

【影像老济南】

□陈强

这张老照片曾在本栏目刊出,笔者深入调查后发现,卖“钱”行当的背后故事令人唏嘘。

这张日本发行的明信片,发行时间约为1907年—1917年,明信片的日文注释中,竟然将中国流通的制钱(官方铸造的方孔铜钱)称为“济南特产”,年输出量高达1000万枚以上。图中即将被转运或熔炼的制钱堆积如山,两个人坐在其中,一个戴鸭舌帽的日本不法商人和一个手拿铁锹、肩搭毛巾的中国苦力坐在一起,获利甚丰的日本商人表情凝重,获得蝇头小利的中国人却面带微笑,他或许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也不会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制造枪炮弹的重要原材料铜和锌需求量激增,由于市场上这两种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扶摇直上。而当时中国流通的制钱,基本上是由铜、锌两种材料铸成,其中铜的含量为1/2,锌的含量为1/4。日本的奸商、浪人见有利可图,便利利用日军武力占领山东的时机,在山东境内大肆非法贩卖中国制钱。他们以低价收购中国制钱,通过胶济铁路运至青岛,再由海船运至日本,经熔化提取铜锌后,再高价

日本在济南的制钱走私活动



出售给欧战各国,从中牟取暴利。

日本人最初是亲自收购制钱,原物运走,通过车载或雇佣苦力腰缠、肩挑运送至胶济铁路车站到青岛,再装船水运至日本国内进行精炼。后来为避人耳目,同时为便于运输,节省运费,日商又在山东各地设立熔炉,就地熔铸成铜块后再运往日本。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收买中国奸商和不法商人代为收购和熔炼。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介绍,1916年的制钱市场价为每百斤约值大洋17元左右,而日本人均照20元预先给付,所以内地的奸民争相向日本人效力,非法代购制钱。

日本人贩卖中国制钱的行为是中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三令五申严禁贩运

制钱,日本驻济南领事林久治郎也于1915年11月19日发出了禁止日本人贩卖制钱的告示。但实际上,日本当局不仅未予切实禁阻,反而在济南日本驻军的保护下,更加有恃无恐地纵容、包庇制钱走私行为。1917年3月9日,日本人在济南违禁贩卖制钱,商埠警察对其运钱车辆查验时,遭到日本人枪击,中国巡长被日本军人捕去,经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到日本驻济南领事馆进行交涉后才被释放。

由于制钱是当时中国的重要流通货币,日本人在山东走私制钱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山东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民国初年被日本人掠走的制钱数量已无法计算,据日本人统计,仅1915至1917年的三年间,日商运到青岛的制钱及熔铸铜块合计达10万吨。日商的大肆掠取,致使山东以至邻近各省的制钱日少,严重影响了市面流通。制钱行情的上涨,又间接引起了银元价格的昂贵,导致了金融恐慌,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直到1922年日本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在山东走私中国制钱的行为才逐渐停止,但走私制钱行为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和造成的深远影响却远未停止。